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
国家“211工程”、“985工程”项目承担机构



简报

2011年第3期（总第25期）

本期目录

中心大事记	(1)
科研活动	(3)
学术成果	(5)
主要获奖	(8)
学术交流	(9)
媒体传播	(28)

中心大事记

2011.9-2011.12

CRPE 主任史晋川教授任省政府咨询委副主任

浙江省人民政府于 2011 年 12 月发文（浙政发[2011]95 号），增补浙江省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史晋川委员为省政府咨询委副主任。

浙江省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是省委、省政府为推动决策过程的科学化、民主化而建立的决策咨询机构，是省委、省政府领导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参谋部和智囊团，是听取专家意见、吸纳民意的桥梁，是综合性、战略性和政策性的决策咨询服务平台。省咨询委所承担的决策咨询任务，为省委、省政府负责。

史晋川教授长期从事现代经济理论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曾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英国伦敦经济学院（LSE）做访问教授，参与了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至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研究及咨询工作，著有《社会主义经济通货膨胀导论》、《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温州模式研究》等

20 余部学术著作，在国际和国内学术期刊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 100 余篇，10 余次获国家级和省、部级奖励，1992 年入选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1999 年后入选国家人事部等七部委的“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教育部跨世纪中青年学科带头人，中宣部全国文化宣传系统“四个一批”人才，2007 年入选首届中国杰出社会科学家，2009 年入选“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 100 名经济学家”，是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史晋川教授自 1997 年起一直担任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委员，同时也是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决策咨询专家。

科研活动

科研项目立项

1. 史晋川, “应对‘中等收入陷阱’挑战——从经济、社会、体制转型视角的综合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项目起止时间 2011. 10-2014. 12。
2. 黄先海, “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的机制、路径与政策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项目起止时间 2011. 10-2014. 12。
3. 史晋川, “呼包银重点经济区发展规划”, 国家发改委重大项目, 项目起止时间 2010. 12-2012. 12。
4. 叶建亮, “资源性产品管制政策研究——基于纵向关联与多目标协同的视角”, 省社科青年项目, 项目起止时间 2011. 9- 2013. 9
5. 张小茜, “民营企业融投资决策研究——基于公司层面的 ICF 敏感性分析”, 省社科青年项目, 项目起止时间 2011. 9-2013. 9。
6. 汪炜, “浙江‘金融强省’建设内容及评价体系”, 浙江省政府部门项目, 项目起止时间 2011. 7- 2012. 6。

7. 余逊达, “社会评价意见‘七难问题’分析报告”, 其他政府部门项目, 项目起止时间 2011.3-2011.7。
8. 曹正汉, “分散烧锅炉——中国的行政治理结构及其演变趋势”, 浙江大学自主创新项目, 项目起止时间 2011.11-2013.12
9. 曹正汉, “国家与市场关系研究”, 企事业委托项目, 项目起止时间 2011.11-2012.12。
10. 汪炜, “浙江金融创新与科技创新互动问题研究”, 企事业委托项目, 项目起止时间 2011.12-2013.11。
11. 史晋川, “宁波市服务业‘十二·五’发展规划”, 企事业委托项目, 项目起止时间 2010.5-2011.10
12. 史晋川, “温州地方金融创新体系建设”, 企事业委托项目, 项目起止时间 2010.11-2011.11
13. 赵伟, “转型视野下的民营企业成长问题研究:制度变迁与路径选择”, 企事业委托项目, 项目起止时间 2011.9-2013.10。
14. 陈凌, “《家族企业的角色:过去,现在,未来》中文书稿”, 企事业委托项目, 项目起止时间 2011.5-2012.5。
15. 黄先海, “杭州市十大产业领军人物、龙头企业及产业推进先进单位(个人)评选标准研究”, 企事业委托项目, 项目起止时间 2011.11-2012.11。
16. 黄先海, “杭州市十大产业重点企业评价体系研究”, 企事业委托项目, 项目起止时间 2011.11-2012.11。
17. 张小茜, “基于时间序列分析的相对价值多空策略研究”, 企事业委托项目, 项目起止时间 2011.10-2012.11。

学术成果

论文

1. Wetzstein HY, 张自斌, Ravid N, Wetzstein ME: “Characterization of Attributes Related to Fruit Size in Pomegranate”, HORTSCIENCE, 2011. 6。
2. 潘士远: “Competition among the Elites, Property Rights Protection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1.10。
3. 曾道智、朱希伟: “Tourism And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The Japanese Economic Review, Vol. 62, No. 4, December 2011.
4. 黄先海: “中国出口技术结构演进的机理与实证研究”, 管理世界, 2011 年第 3 期。
5. 赵婷、金祥荣: “出口集聚之溢出效应研究——基于中国企业层面数据的实证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 2011 年第 12 期。
6. 赵伟、郑雯雯: “市场重心变化与制造业空间重构: 小企业视点的分析与实证”, 国际贸易问题, 2011 年第 11 期。

7. 王俊、黄先海: “跨国外包对我国制造业就业的影响效应”, 财贸经济, 2011 年第 6 期。
8. 王志凯、史晋川: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状况及原因分析”,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1 年第 6 期。
9. 叶航、王国梁: “排他性机制的重构和准公共产品受益的均等化——一种实现包容性增长的新路径”,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1 年第 6 期。
10. 黄先海、杨君: “资本形成和流动对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1 年第 4 期。
11. 余逊达: “群众路线、全球视野与党的领导”,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1 年第 4 期。
12. 曹正汉、史晋川、宋华盛: “为增长而控制——中国的地区竞争与地方政府对土地的控制行为”, 学术研究, 2011 年第 8 期。
13. 史晋川: “浙江的科学发展在于全面转型”, 浙江经济, 2011 年第 1 期。
14. 史晋川: “市场转型的力量”, 浙江日报, 2011 年 6 月 27 日。
15. 史晋川: “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浙江日报, 2011 年 5 月 27 日。
16. 史晋川: “高层建领谋划未来——评省金融‘十二五’规划”, 浙江日报, 2011 年 7 月。
17. 史晋川等: “浙江省‘十二·五’发展战略思路研究”, 载《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与区域经济走势》(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 2011 年韩文版), 2011 年 9 月。
18. 史晋川: “求解温州民间金融”, 财经, 2011 年第 29 期。
19. 史晋川: “危局、难局、困局中的民营企业”, 观察与思考, 2011 年第 11 期。
20. 曹正汉: “解释制度的两个因素: 功能和深层结构”,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年第 4 期。
21. 汪淼军, “博弈论和机制设计国际研讨会暨第 2 届求是之星经济学论坛”, 国际学术动态, 2011 年第 5 期。
22. 赵伟: “全球经济‘二次衰退’为时尚早”, 大经贸, 2011 年第 6 期。

23. 赵伟: “‘后跑路’与民企金融‘双困局’”, 大经贸, 2011 年第 8 期。
24. 赵伟: “制度依赖型产业”, 浙江经济, 2011 年第 8 期。
25. 赵伟: “‘市场药’遭遇‘计划病’”, 浙江经济, 2011 年第 9 期。
26. 赵伟: “产业救助: 美国式的”, 浙江经济, 2011 年第 10 期。
27. 赵伟: “比较腐败学”, 浙江经济, 2011 年第 11 期。
28. 赵伟: “美式量化宽松与中式非量化宽松”, 浙江经济, 2011 年第 12 期。
29. 赵伟: “世界级城市的魅力何在”, 浙江经济, , 2011 年第 13 期。
30. 赵伟: “物价怎么了”, 浙江经济, 2011 年第 14 期。
31. 赵伟: “下一次袭来的或许是‘龙苔’”, 浙江经济, 2011 年第 15 期。
32. 赵伟: “‘西北偏北’引出的麻烦”, 浙江经济, 2011 年第 16 期。
33. 赵伟: “中国靠什么影响世界经济?”, 浙江经济, 2011 年第 17 期。
34. 赵伟: “通胀或将反反复复”, 浙江经济, 2011 年第 18 期。
35. 赵伟: “诊断‘中等收入陷阱’”, 浙江经济, 2011 年第 19 期。
36. 余逊达: “公民参与与公共民生问题的解决: 对杭州实践的研究和思考”, 杭州(我们), 2011 年第 2 期。
37. 余逊达: “社会管理创新所面临的挑战及对策分析”, 杭州(我们), 2011 年第 8 期。

调研报告

1. 史晋川、何嗣江等, “温州地方金融创新体系建设”, 温州市政府采纳。
2. 史晋川、何嗣江等, “宁波市服务业‘十二·五’发展规划”, 宁波市政府采纳。
3. 史晋川等, “浙江未来 20 年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研究”, 省咨询委采纳。
4. 史晋川, “浙江对外投资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省咨询委采纳。
5. 史晋川、董雪兵等, “中国西部大开发‘十二五’规划研究”, 国家发改委采纳。

主要获奖

1. 张自斌, “Food versus Fuel: What do Prices Tell Us?” (论文), 浙江省第十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浙江省社联, 2011. 12。
2. 肖文, 林高榜, “跨国公司 R&D 国际化与中国自主创新” (专著), 2011 年浙江省高校科研成果奖一等奖, 浙江省教育厅, 2011. 11。
3. 张小茜, “持股结构、决议机制与上市公司控制权” (论文), 浙江省社科联第三届社科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2011. 1。

学术交流

举办和出席会议

空间经济学—企业国际化国际研讨会圆满落幕

由浙江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主办，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CRPE）与经济学院提供支持的“空间经

济学视野的企业国际化”国际研讨会，于 2011 年 4 月 3 日在杭州金溪山庄圆满举行。著名经济学家，空间经济学的两位主要开拓者藤田昌久 (Fujita, Masahisa) 教授和 Venables 教授参会，浙江大学罗卫东副校长到会致辞。

会议收到高水平的学术论文 20 多篇，来自日本、英伦及欧陆数国多位海外学者与来自京、沪、杭等地十几位国内学者集聚一堂，从空间经济学及其最新发



藤田昌久教授

维纳布斯教授

展视野切入,就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动、企业国际化、产业集聚等问题进行了颇具专业深度的探讨。此次会议属于国际经济研究所举办的第八次国际学术年会,会议延续以往年会传统,以学术交流为第一要务,以英文为工作语言,国际接轨,给每位与会者以同等的交流机会。

开幕式上,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卫东教授代表学校致辞。他首先向藤田昌久教授及经历了大地震和海啸系列灾难的日本人民表述亲切慰问,向藤田和维纳布尔斯两位大师级经济学家表示敬意,对他们和海内外其他学者远道而来参会表示热烈欢迎。并对浙大国际经济研究所连续十年举办高水平国际会议予以高度评价。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黄先海教授代表金祥荣常务副院长及学院致辞。



会议由浙江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CRPE 首席教授赵伟担任主席,由藤田昌久教授(日本学士院院士、经济产业研究所所长)、维纳布尔斯教授(牛津大学)、尹翔硕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及赵伟教授轮流主持。藤田昌久教授、维纳布尔斯教授、赵伟教授等先后做了主题讲演,肖文教授、黄先海教授、杜德斌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潘士远教授、殷凤教授(上海大学)、希尔顿副教授(宁波诺丁汉大学)、李磊副教授(宁波诺丁汉大学)、叶建亮副教授、宋华盛副教授、李杰副教授、赵婷博士等先后作了主题发言。赵伟教授、藤田昌久教授、维纳布尔斯教授、赖斯博士(牛津大学经济系副主任)、米开朗博士(伦敦大学)、沈瑶教授(上海大学)、尹翔硕教授(复旦大学)、肖文教授、潘士远教授、杜德斌教授等分别做了精彩的点评,会议气氛活跃且充满了浓郁的学术气氛和国际化氛围。

❁ CRPE 召开 2011 年度工作会议

丹桂飘香的金秋十月, CRPE 在杭州植物园上林苑召开 2011 年度工作会议。CRPE 主任史晋川教授、副主任汪炜教授以及 CRPE 所有专职研究人员参加本次工作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为: 检查与督促 CRPE 历年立项课题以及商讨 CRPE 成立“十周年”庆祝事宜。

汪炜教授首先介绍了 CRPE 历年重大课题立项情况以及“十一五”研究选题拟定情况。史晋川教授对 CRPE 历年重大招标项目的研究质量和研究进度提出了明确要求和期望, 要求已经到期的研究项目在确保研究质量的情况下应尽快结题。会议讨论并确定了 2012 年 CRPE 重大招标项目的选题, 并准备近期设立自主研究项目支持 CRPE 研究人员开展期限相对较长的探索研究, 鼓励 CRPE 研究人员进行长期积累, 培育能产生重大学术影响的标志性成果。最后, 史晋川教授介绍了明年中心成立“十周年”庆祝活动的初步设想, 与会人员针对 CRPE“十周年”庆祝活动献计献策, 会场气氛非常活跃。



❁ “浙江大学恒逸基金 2011 年度工作会议”顺利召开

浙江大学恒逸基金管理委员会 2011 年工作会议于 2011 年 9 月 29 日下午在杭州召开。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胡远华副总经理, 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史晋川教授、执行主任金祥荣教授、副主任汪炜教授, 浙江大学化工系主任任其龙教授, 浙江恒逸石化有限公司研发管理中心徐锦龙总经理,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楼翔副总经理、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杨一行经理, 浙江大

学发展联络办项目管理部鲁小双副主任等 16 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史晋川教授主持。

汪炜教授首先作 2010 年基金工作汇报, 并对三年来基金运作作了全面、系统的总结性回顾。史晋川教授对 2010 年基金资助经费使用情况进行说明, 同时根据实际情况, 对 2011 年基金使用预算作了部份调整。会议审核并通过了 2010 年奖教金、讲座教



授、中国民营经济研究项目的申请, 同时审核并通过了 2009 年讲座教授的结题报告。会议还就“浙江大学恒逸讲座教授招聘及管理具体操作方案”及“2011 年度论坛策划方案”进行了讨论, 并提出了修改意见。

基金管委会各位委员在会上畅所欲言, 对基金各项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也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建议。校基金会对本次会议也给予了很大的支持, 并表示会积极帮助协调学校各相关部门。

最后由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胡远华副总经理和史晋川教授分别代表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及基金管委会作总结发言。胡远华副总经理对基金项目 2010 年的实施运行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并对具体项目的实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及更具体的建议, 希望基金资助的项目能更好地切合企业需求, 更多地与企业进行多层面的互动。并表示, 恒逸集团一向注重教育事业, 重视人才培养, 希望借助对浙大基金的资助方式, 回报社会并同时影响社会来更多的关注高等教育事业,



更强调在具体工作上会给予大力配合, 共同努力提升基金品牌形象。史晋川教授在最后的总结中指出, 此次会议, 很好地总结了上年度的工作, 在肯定的同时, 也对管理工作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及更高的要求, 更特别感谢恒逸集团、校基金会及相关院系对基金工作的大力

支持。

❁ 2011 年“恒逸学术论坛”(秋季) 成功举办

2011 年 10 月 28 日下午, 由浙江大学恒逸基金管理委员会、杭州市萧山区经济发展局、杭州市萧山区工商业联合会主办, 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承办的浙江大学“恒逸学术论坛(秋季)”在萧山商会大厦四楼会议室如期举办, 参加此次论坛的有萧山



区机关单位工作人员、企业负责人和工作人员、恒逸集团中高层管理人员和相关社会人士等共 280 余人出席了本次论坛。论坛由萧山区工商业联合会楼海祥会长主持。

本次论坛邀请了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浙江大学金融研究所所长、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货币信贷政策咨询专家王维安教授为学员们做《宏观金融形势分析——欧美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与企业应对策略》的主题讲座。王教授从欧美主权债务危机的起因、各政府的救市政策、后危机时代的全球主权债务风险、资产价格及黄金走势等内容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 用幽默智慧的语言与丰富翔实的数据为大家带来了一场精彩的听觉盛宴。讲座最后王教授还针对欧美债务危机对企业的影响, 为企业提出了四条应对策略, 指导企业今后的



投资与发展规划。论坛现场座无虚席, 与会者纷纷表示, 王教授的讲座深入浅出, 拨云见日, 数据翔实且说服力强, 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当前金融形势及其后期走势的认识和把握, 对企业今后的发展和金融风险的规避提供了明确的指导, 让我们受益匪浅!

❁ 论道宏观经济形势 解惑 民企发展困局——“第四届民 营企业可持续发展高层论坛” 圆满结束



2011 年是“十二五规划”开局之年，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期。“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民营企业作为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如何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中，提升自身创新能力和应对能力，抓住机遇，加快发展？

11 月 12 日上午，第四届民营企业可持续发展高层论坛“十二五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民企发展对策”，在浙江省人民大会堂国际报告厅隆重举行。论坛邀请了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局局长李连仲等著名专家，围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一主题，根据当前经济金融形势，结合民企发展对策问题进行研讨，为广大民营企业企业家搭建一个互动交流平台，同时，期待为整个浙江民营企业可持续发展带来新思路。

第四届民营企业可持续发展高层论坛是由浙江大学和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主办，浙江大学恒逸基金管理委员会和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承办，浙江省企业发展研究会、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继续教育中心、浙江大学企业家经理人同学会协办。

出席本次高层论坛的重要嘉宾有：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局局长李连仲，中国人力资源发展研究会会长刘福垣，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秦虹，浙江大学校长助理、校发展联络办公室主任张美凤，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远华，浙江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CRPE）主任史晋川，浙江大



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汪炜,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黄先海, 浙江省企业发展研究会会长童炽昌及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部份高层主管、企业家代表共 300 余人。

浙江大学校长助理张美凤和浙江恒逸集团副总经理胡远华, 分别在论坛开幕式上致辞。

张美凤在致辞中表示, 近年来民营经济整体实力不断增长, 是十二五期间自主创新和转型升级的重要新生力量。民营企业的生存问题, 直接影响了中国未来经济趋势的发展。浙江大学将凭借自身优势, 密切关注民营经济发展前沿, 加强研讨深度, 推进区域合作, 把握发展机遇, 积极探索适合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特色之路, 不遗余力地为推动民营企业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胡远华在发言中介绍到, 浙江大学恒逸论坛, 是浙江大学恒逸基金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服务民营企业的品牌项目, 自 2008 年以来每年举办一届综合性的年度论坛, 旨在搭建一个知识共享和互动交流的平台, 提高民营企业家的经营能力和管理水平, 推动浙江民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至今已成功举办了三届, 受到了社会各界和民营企业家的广泛认可。

论坛开幕式结束后, 大会进入主题演讲阶段。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局局长李连仲, 首先就《十二五: 如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表演讲, 李连仲认为民营企业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认清国内、国际形势, 除了宏观因素的考量, 要治标治本, 民营企业要积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符合十二五规划, 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由外贸拉动经济增长转变为扩大内需、投资、外贸三驾马车协调发展。此外,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还要和金



融相结合，没有金融的支撑，企业发展步履维艰。中国要实现经济金融化就要大力发展资本市场，鼓励金融创新，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相结合。

中国人力资源发展研究会会长刘福垣做《中小民营企业融资难之对策》专题演讲，从宏观经济走势、民间金融形态及中小企业的发展态势、融资等问题作了深刻的剖析。

国家住房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秦虹就《国家十二五规划与房地产政策分析》做主题演讲，就目前房地产市场正面临结构性调整、市场需求及对于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未来发展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认为企业应该转变观念，认清当前的外部环境和政策走向，积极调整，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扩展企业的发展空间。



三位重量级嘉宾的演讲，高屋建瓴，全面透彻分析宏观经济形势，为民营企业发展难题提出独到见解，并通过微博互动，实时解答现场企业家提出的发展困惑，妙语横生，气氛热烈。钱江晚报、浙江大学报、新浪网、浙江卫视、浙江经视等多家媒体现场进行了采访报道。

🌸 汪炜教授在“2011 浙商投资年会”发表演讲

2011 年 8 月 6 日，应主办单位邀请，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浙江大学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汪炜教授出席“2011 浙商投资年会”，并发表“浙江金融的创新发展及浙商投资机会”的主题演讲。本届“浙商投资年会”以“从浙商制造到浙商投资、从浙商产品到浙商资本”为主题，千余位嘉宾齐聚杭州之江饭店千人大会场，共同探讨新形势下浙商的投资思路及战略取向。

汪炜教授在演讲中，从浙江“十二五”金融发展核心问题——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和民间资本投资难“两难困局”入手，提出了发展“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组织）”和“私募股权直接投资体系”的浙江金融业未来创新发展方向，进而探讨了浙商资本在这两个领域的发展空间及投资策略。演讲受到与会听众的热烈欢迎。演讲结束后，汪炜教授还参加了题为“中国城市化进程与浙商机遇”的主题对话。

❁ 宋华盛副教授应邀赴韩国参加国际会议

CRPE 宋华盛副教授于 2011 年 8 月 10 日—14 日应邀赴韩国首尔参加由高丽大学承办的计量经济学会 (Econometrics Society) 2011 年度亚洲分会 (Asian Meeting of the Econometrics Society 2011)。

此次会议上, 宋华盛副教授携近期的研究成果在大会上演讲讨论, 引起了与会学者的广泛兴趣, 两篇参与讨论的论文名分别为“The Dynamics of Industries with Scarce Durable Resources”和“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Multi-product Firms”。

❁ 赵伟教授做客岭南大讲坛 漫谈国内外经济热点问题

应岭南大讲坛主办方的邀请, 浙江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CRPE 首席教授赵伟于 2011 年 8 月 27 日 (星期六) 做客广东“岭南大讲坛·文化论坛”, 就当前物价与国内外经济走势等热门经济话题, 做了一场公开讲演。

论坛设在著名的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当日上午十时准时开讲。在论坛主持人王静和嘉宾主持人——广东省社科院丁力教授简短的介绍之后, 赵伟教授以“美债危机与乔布斯的苹果”、中国 CPI 与“郭美美事件”两组“热门话题”作为开场白, 将论坛引入高潮。而后围绕“物价怎么了, 经济何处去?”, 以幽默轻松的漫谈形式, 从微观视野分析了国内物价走势, 以空间经济学视野展示了国内外经济走势。讲座自始至终气氛活跃, 高潮迭起, 中山图书馆学术报告厅座无虚席, 5 百多位广州市民聆听了赵伟教授的精彩讲演。

《岭南大讲坛·文化论坛》系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社科联主办的高规格论坛, 由南方日报集团、广东岭南文博研究院和广东中山图书馆等单位承办, 被文化界视为国内三大最具影响力的高层次讲坛之一, 在海内外文化与学术界具有很大的影响。



❁ 史晋川教授出席长三角民营经济高峰论坛

第六届长三角民营经济高峰论坛于 2011 年 9 月 28 日在杭州市浙江省人民大会堂召开,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路甬祥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了重要讲话, 省委书记赵洪祝、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夏宝龙发来了贺信。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新立、全国工商联秘书长王忠民、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史晋川, 应邀出席并在论坛发表主旨演讲。史晋川教授发表了题为“危局·难局·困局中的民营企业”的主旨演讲, 分析了国际经济环境和国内宏观经济背景下浙江民营企业面临的困局产生的深层原因, 并建议应改变单一货币政策为主的宏观调控方式, 通过给中小企业和中低收入者减税的方式, 来为中小企业纾困, 鼓励企业投资, 增加居民消费, 实现宏观经济运行的软着陆。

❁ 汪炜教授在“温州小微企业融资创新论坛”发表主题演讲

中小企业融资难一直是困扰我国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发展的难题, 2011 年二季度以来, 温州中小企业融资困境和部分企业资金链断裂已引起上至国家领导、下至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此背景下, 2011 年 10 月 20 日, 温州瑞安市政府金融办和经贸局联合举办了“温州小微企业融资创新论坛”, 邀请国内外学者和专家共同探讨小微企业融资创新问题。应瑞安市政府邀请, CRPE 副主任汪炜教授作为主讲嘉宾, 出席论坛并做了题为“温州金融: 如何破解两难困局”的主旨演讲。论坛期间, 瑞安市常务副市长蒋良奉出席会议并致辞, 赛伯乐投资陈斌总裁、涌金仓储董天水董事长等专家分别就股权投资和金融仓储业务创新做了大会发言。



❁ CRPE 秘书长朱希伟博士赴韩参加 KIEP 会议

受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 (KIEP) 的邀请, 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 (CRPE) 秘书长朱希伟博士于 2011 年 11 月 22 日-25 日赴韩国首尔参加 KIEP 组织的“转型期中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 课题与启示”的专题研讨会。

朱希伟博士在会上做“浙江省传统产业集群的升级问题”的报告, 介绍浙江省传统产业集群的升级所面临的问题及其应对策略, 受到与会韩国专家的广泛关注。

CRPE 将继续鼓励和支持年轻研究人员参与国际学术交流, 扩大 CRPE 的国际知名度和学术影响



❁ 汪炜教授出席“第九届中小企业融资论坛”并发表演讲

2011 年 12 月 1 日, CRPE 副主任汪炜教授应深圳证券交易所邀请, 出席了在深圳洲际酒店召开的“第九届中小企业融资论坛”。深圳市市长许勤、深圳证券交易所理事长陈东征等到会致辞, 深圳证券交易所总经理宋丽萍主持会议, 中国证监会主席郭树清、全国人大财经委法案室主任朱少平等发表主题演讲。论坛期间, 汪炜教授发表了“填补麦克米伦缺口, 政府还能做什么”的演讲, 提出的大力发展中小金融机构、创新发展区域性直接融资体系和政府应该更多地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实质性扶持等观点和政策建议, 获得与会代表的肯定并产生积极反响。

❁ 汪炜教授出席并建言“杭州股权投资发展研讨会”

2011 年 12 月 2 日, CRPE 副主任汪炜教授应邀出席了由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杭州市政府办公厅主办的“杭州股权投资发展研讨会”。杭州市市长邵占维、副市长杨戌标, 浙江省委政研室主任郭占恒等省市领导和 60 余位部门、股权投资机构、高等院校代表和专家出席了会议。汪炜教授在会上围绕杭州建设股权投资机构集聚区的布局和建设模式提出了系统的建议, 并得到省市领导的重视, 邵占维市长特别指出汪炜教授提出的构建股权投资产业配套体系的建议与杭州市政府不谋而合, 希望浙江大学和杭州市一起策划组织, 明年春暖花开之时在杭州共同举办“中国私募股权投资论坛”。

❁ 史晋川教授在 2011 年中国经济学年会演讲

2011 年 12 月 10 日, 浙江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 浙大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浙大金融研究院副理事长史晋川教授出席了在上海财经大学召开的 2011 年第十一届中国经济学年会, 并应邀在大会主题论坛上作了题为“金融合约执行机制和民间金融风险”的演讲。史晋川教授运用历史比较制度的理论, 深入分析了温州民间金融组织和活动的人格化特征的金融合约执行机制及其内在的局限性, 指出人格化的金融合约执行机制失灵是近期温州民间金融风险大规模集聚和大规模爆发的根本制度性原因, 并提出民间金融改革和发展的正确方向不是仅仅简单地放开民间金融活动, 而是必须通过建立和完善金融活动领域的法律和法规, 用基于法律的非人格化金融合约执行机制来取代人格化的金融合约执行机制, 从而来促进金融深化, 规范金融市场秩序, 提高金融活动效率, 防范金融风险的集聚和爆发。



学术访问与学术讲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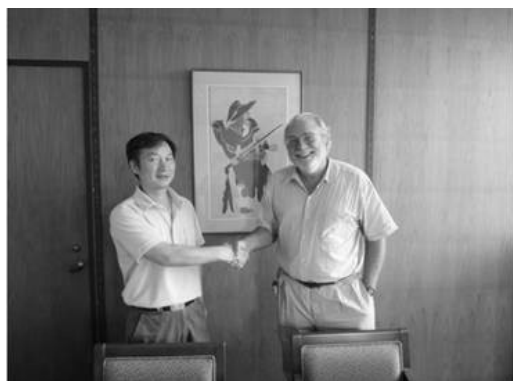
韩国对外政策研究院李尚熹研究员访问 CRPE

2011 年 8 月 21 日上午, 韩国对外政策研究院李尚熹研究员在韩国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杭州代表处李在翎馆长的陪同下, 访问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 (CRPE), CRPE 主任史晋川教授会见了李尚熹一行。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主任杨柳勇教授、浙江大学金融研究院何嗣江副教授等人陪同会见。

史晋川教授介绍了浙江民营经济发展情况和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的研究状况, 并就浙江省产业集群发展、民间金融发展等问题与到访嘉宾做了深入的交流。

王志凯博士完成哥伦比亚大学访问

受浙江大学文科专项计划资助, CRPE 副教授王志凯博士于 2011 年 6 月——2011 年 9 月, 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研究。访问期间, 王志凯博士就民营经济与城市化、行政区划与经济空间、经济发展与地区差异等问题, 继续进行深化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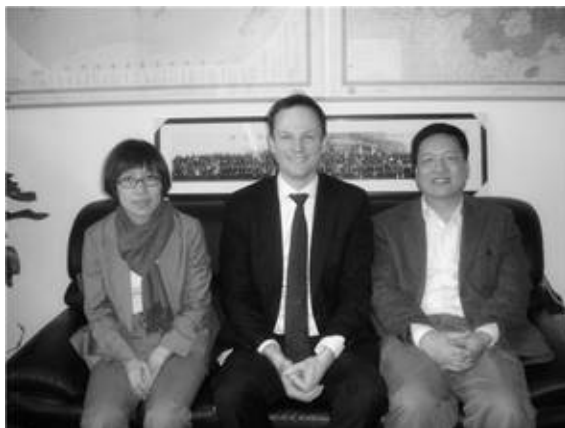
围绕区域经济、产业政策和海洋开发等专题, 与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系、商学院的教授进行了细致交流; 针对区域发展与财政

与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系主任,
Michael H. Riordan 教授亲切会面

政策、市场与规制等议题, 与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俄罗斯及东欧研究所相关教授, 进行了密切探讨; 双方就未来可能的研究合作, 形成了共识。在响应和落实浙江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的交流合作上, 身体力行, 积极尝试。

✿ 美国上海总领事馆官员来访 CRPE

10 月 31 日上午, 美国上海总领事馆经济官员冯以宏 (E·T·Felsing) 和助理徐佳女士来杭访问了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 (CRPE), 就浙江的区域经济发展, 尤其是温州近期的金融经济形势, 专访了 CRPE 主任史晋川教授。史晋川教授接待了来访的美国上海总领事馆的来访官员, 并就温州的金融问题, 政府的税收政策和“十二·五”规划的实施等问题, 接受了美领馆官员的专访。双方对本次访问都十分满意, 表示今后将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



✿ 赵伟教授赴中山大学、暨南大学讲学

应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和暨南大学经济学院的邀请, CRPE 首席教授、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赵伟教授于 11 月 27~12 月 1 日赴广州, 对这两所享誉海内外的华南名校进行了学术访问, 并做了三场学术报告。其中一场为面向中大本科生的公开讲演, 两场为面向研究生和教师的专题学术报告。公开讲演



题目为“校园漫谈: 变化的经济世界与我们的福祉”。讲演场面气氛热烈, 4 百多座位的报告厅爆满, 部分学子甚至站着听完讲演, 互动环节问答更为热烈。专题学术报告的题目为“浙江模式: 一种理论解释”。暨大经济学院和中大岭南学院近百位研究生及老师先后听讲, 并围绕讲座主题进行了互动。

讲学期间, 赵伟教授还会见了中大岭南学院和暨大经济学院有关领导及多位知名经济学人, 交换了未来学术交流与合作的意向。赵伟教授的此次讲学, 无疑有助于扩大浙大经济学人与浙江模式研究在珠三角高校的学术影响。

✿ 藤田昌久与维纳布尔斯教授举办系列讲座

应 CRPE 赵伟教授和金祥荣教授的共同邀请,日本学士院院士藤田昌久教授和英国牛津大学维纳布尔斯教授于 2011 年三月底四月初来杭,出席浙江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主办(浙大经济学院与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支持)的系列学术活动。

藤田昌久(Masahisa Fuita)教授与维纳布尔斯(Anthony J. Venables)教授系新经济地理学的两位主要开拓者,在全球经济学界享有很高的声望,同时邀请两位大师级经济学家来访,实为浙江大学经济学人与学子们的一桩幸事。为此借两位名家访问之际举办了一个系列学术讲座,讲座的主题为“空间经济学前沿——与经济学名家对话”,受到相关专业学生的热烈欢迎。

✿ Horst Raff 教授系列讲座

德国基尔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 Horst Raff 教授于 2011 年 5 月 17-19 日为 CRPE 和经济学院的广大师生开设了 2 场次主题为“International Trade, Firm Heterogeneity and Intermediation”的系列学术讲座,内容包括“International Trade with Heterogeneous Firms”和“Intermediation in International Trade”

✿ 宋顺锋教授 2011 年系列讲座

2011 年 5 月-6 月,宋顺锋教授为 CRPE 和经济学院的广大师生开设了 6 场次的系列讲座,内容包括(1)城市化、城市增长与经济发展文献回顾;(2)城市集聚经济学:理论与实证;(3)产业组织:空间的视角;(4)城市空间机构与演化、城市体系;(5)城市住宅:中国与美国的问题与政策;(6)其他城市问题:土地与城市交通。宋顺锋教授现任教育部浙江大学长江讲座教授,中国留美经济会董事会董事,中国留美经济会学术出版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林肯研究院城市发展与土地政策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北京大学中国公共财政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客座教授,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兼职教授,《Social Science Journal》副主编,

《China Economic Review》和《Journal of Urban Management》编委,《The Chinese Economy》特邀主编,《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辑委员会海外编委,教育部《长江学者计划》海外评委。

日本东北大学曾道智教授短期授课

日本东北大学教授、浙江大学永谦讲座教授曾道智老师于 2011 年 9 月 5 日-13 日为 CRPE 开展短期教学,教学的主要内容有空间经济学的展望、新经济地理、新贸易理论及空间经济学的应用。曾道智教授毕业于日本京都大学研究生院工学研究科,现为日本东北大学教授。曾教授长期致力于空间经济学、博弈论方面的研究。他的研究成果曾发表在《发展经济学杂志》、《城市经济学杂志》、《经济地理学杂志》、《环境经济和管理杂志》等经济学专业领域的顶级期刊,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是一位在国际经济学界有重要影响的华人经济学家。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蒋岳祥教授讲座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蒋岳祥教授分别于 2011 年 9 月 27 日和 10 月 25 日为 CRPE 和经济学院师生开展了主题为“随机变量的非回归关系——理论与应用”上、下 2 场次的学术讲座,受到相关专业学生的热烈欢迎。

《世界经济》编辑部宋志刚讲座

《世界经济》编辑部副主任宋志刚于 2011 年 10 月 22 日访问 CRPE,并为 CRPE 和经济学院的广大师生开设了题为“《世界经济》杂志的选稿原则及选题趋势”的讲座。

☞ 特色学术活动：CRPE “双周青年学者论坛”

☞ 第 150 期

报告时间：2011 年 9 月 15 日

报告题目：Reducing Regional Disparities in China: Is Investment Allocation Policy Effective?

报告人：Prof. Nicolaas GROENEWOLD (The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

☞ 第 151 期

报告时间：2011 年 9 月 23 日

报告题目：Optimal Auction Design under Uncertainties: The Role of Return Policies

报告人：张军 (上海财经大学)

☞ 第 152 期

报告时间：2011 年 10 月 12 日

报告题目：Processing Trade, Tariff Reductions, and Firm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Chinese Products

报告人：余淼杰 副教授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 第 153 期

报告时间：2011 年 10 月 28 日

报告题目: The Last Supper: Complementing Financial Discipline with Bailouts

报告人: 车嘉华 (香港中文大学)

卐 第 154 期

报告时间: 2011 年 11 月 4 日

报告题目: The Effect of BAPCPA on Consumer Bankruptcy Filings and Chapter Composition

报告人: 许冰 (西南财经大学)

卐 第 155 期

报告时间: 2011 年 11 月 9 日

报告题目: 预期和经济波动——预期冲击是驱动中国经济波动的主要力量吗?

报告人: 崔小勇 副教授 (中央财经大学)

卐 第 156 期

报告时间: 2011 年 11 月 18 日

报告题目: Strong forward induction

报告人: 郑兵勇 副教授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卐 第 157 期

报告时间: 2011 年 12 月 2 日

报告题目: The Malthusian Quagmire: Maize and Population Growth in China, 1500–1900

报告人: Shuo CHEN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卐 第 158 期

报告时间: 2011 年 12 月 7 日

报告题目: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Autocracy

报告人: 乔雪 博士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第 159 期

报告时间: 2011 年 12 月 16 日

报告题目: Are Lottery Players Affected by Winning History?

Evidence from China's Individual Lottery Betting Panel Data

报告人: Jia Yuan (University of Macau)

媒体传播

史晋川教授评省金融“十二五”规划

“十二五”时期我省将进一步提升银行、保险、证券公司等“浙商系列”地方金融总部机构的实力。浙江日报杭州 7 月 12 日讯金融强，经济强。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是浙江“十二五”时期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战略，而作为“领头羊”的金融业则是现代服务业的重中之重。“十二五”时期，浙江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有望突破 1 万美元大关。国际经验表明，这一阶段正是金融业高速发展的黄金机遇期。

银行业的“浙银品牌”、证券业的“浙江板块”、保险业的“浙江亮点”、地方金融的“浙商系列”……“十一五”时期，我省构筑起特色鲜明、结构合理、功能完善的金融体系，基本确立了浙江在全国各省中业务发展领先、改革创新领先、服务效益领先、运行质量领先的金融强省地位。那么，未来 5 年，浙江金融业如何实现新的跨越？本报记者今天就此对话“十二五”金融业发展规划主要牵头人、省金融办主任丁敏哲。

“两个中心”撑起金融强省未来

记者：我省“十二五”金融业发展规划起点高、覆盖面广，如何把握未来 5 年浙江金融业发展的主脉络？

丁敏哲：实际上，浙江金融业发展的总体目标思路就是“两个中心、一个强省”，即打造“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和“民间财富管理中心”，建设金融强省。这主要基于浙江的经济特色和金融特色考虑。可以说，放眼全国，目前浙江最具条件建设“两个中心”。

首先，民营经济、县域经济、中小企业是浙江经济的活力和主体所在，与此相对应，浙江在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小金融机构、支持中小企业创业创新的金融生态环境等“三小”特色方面也形成了明显的优势。“十二五”时期，我们将进一步提升浙江金融的“三小”特色，实现浙江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其次，浙江金融业将争创“四大”优势，即通过搭建一批金融服务大平台、建设一批金融发展大项目、支持一批金融企业做大做强、形成“大金融”产业格局，实现浙江金融业的跨越式发展；第三，需要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形成错位发展。浙江只有积极融入，主动对接上海的金融市场、国际金融服务和金融产业链，在金融资源配置和金融服务对象方面形成错位，才能争取同步试点、共享政策，实现借势发展和错位发展、差异化发展。当然，打造“两个中心”的落脚点和最终目的就是要建设金融强省。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金融服务能力要强，另一个是金融产业发展要强，只有两方面都强了，才能称得上是金融强省。

“金融中心”剑指融资难

记者：今年以来，中小企业“钱荒”再度成为焦点。浙江打造“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对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有何创新意义？

丁敏哲：中小企业融资是一个世界性难题，迄今为止，国内还没有省级范围的区域性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更没有国家层次上的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所以，浙江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意义深远，我们希望通过打造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进一步完善和丰富浙江中小企业金融市场体系，优化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从根本上解决中小企业融不到资、融不起资、融不好资的难题。

我省推进“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建设，重点将形成六方面的优势和功能：一是进一步加大信贷资金的保障力度，特别是加大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投入，使浙江成为全国性的“资金洼地”，成为全国对中小企业信贷投入比重最高、中小企业信贷融资最便利的地区之一，最终形成全国领先的中小企业放贷中心功能；二是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多元化资金支持和全方位金融服务，使浙江成为全国性的“资本高地”，成为全国中小企业产业投资最活跃、中小企业投资金融服务最齐全的地区之一，最终形成全国领先的中小企业投资中心功能；三是进一步加大推动企业上市融资的力度，形成丰富的上市公司储备资源，使浙江成为全国中小企业上市数量最多、上市资源储备最丰富、地方产权交易最活跃的地区之一，最终形成全国领先的中小企业直接融资功能；四是进一步提高金融资源的集聚能力，使浙江成为全国中小企业金融服务机构最集中、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数量最多的地区之一，最终形成全国领先的中小金融机构集聚功能；五是进一步加大对金融创新的支持力度，在产业金融、贸易（物流）金融、网络金融、创业金融、绿色金融等领域形成创新优势，使浙江成为全国中小企业金融创新产品最多、融资渠道最丰富的地区之一，最终形成全国领先的中小企业金融创新功能；六是进一步提高金融产品定价的市场化水平，使浙江成为全国最具影响力的中小企业资金定价中心、中小企业金融产品交易中心、中小企业投融资信息中心之一，最终形成全国领先的中小金融产品交易定价功能。

“财富中心”让民资阳光化

记者：与中小企业一样，浙江民资是外界瞩目的另一个焦点，建设民间财富管理中心又是基于什么样的考量？

丁敏哲：中小企业的蓬勃发展，必然滋生财富管理的需求，特别是在经济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中小企业往往需要借助各类财富管理机构的作用，实现从“企业家”到“战略投资者”的角色转变。改革开放 30 年来，浙江民营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积累了丰厚的民间财富，民间资本存量达万亿元，要把民间资本转化为促进浙江经济增长的产业资本，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和经济结构转型，有效拓宽人民群众增加财产性收入的渠道，迫切需要金融部门发挥财富管理的积极作用。同时，为了接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通过功能错位获得借势发展，也需要发挥浙江

民营经济发达、民间资本雄厚的优势,借鉴“纽约—波士顿”模式,在浙江的金融中心城市形成民间投资管理功能优势,实现财富的世界级管理和全球化配置。

推进“民间财富管理中心”建设,将重点形成五方面的优势和功能:一是进一步提高财富管理机构的集聚程度,设立政策优惠、资源聚集的财富管理机构总部集聚区,使浙江成为全国财富管理机构类型最齐全、地方法人财富管理机构数量最多的地区之一,形成全国领先的财富管理机构聚集功能;二是进一步提高财富管理机构服务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能力,强化财富管理机构对中小企业转型升级和资本运营的服务和指导,为民营企业总部基地的建设配套财富管理服务功能,使浙江成为全国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总部金融服务最健全、总部财富管理最领先的地区之一,形成全国领先的民企总部金融服务功能;三是进一步加大对创业风险投资的支持力度,鼓励各类创业风险投资机构(基金)投资浙江中小企业和支持民间创业活动,使浙江成为全国创业风险投资机构(基金)最活跃、本土创业风险投资机构(基金)数量最多的地区之一,形成全国领先的创业投资管理中心功能;四是进一步加大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产业投资基金的支持力度,鼓励产业投资基金投资浙江优势主导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优质中小企业,鼓励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通过投资成长性中小企业推动企业上市,使浙江成为全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和产业投资基金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形成全国领先的产业投资管理中心功能;五是进一步提升财富管理机构的产品和服务创新能力,包括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财富管理业务的服务品种和类型,证券、期货公司的资产管理业务等,使浙江成为全国财富管理业务门类最丰富、创新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形成全国领先的财富管理服务创新功能。

专家声音 高屋建瓴谋划未来 史晋川

《浙江省“十二五”金融业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是在浙江经济社会发展正处在全面转型发展的关键背景下制定的。基于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基础、国内外发展环境以及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规划》提出着力打造具有全国影响的“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和“民间财富管理中心”,进一步推进“金融强省”建设的发展目标,这符合浙江省“八八战略”和“两创”总战略的要求,同时也体现了现代金融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浙江金融业发展特色。

“十二五”时期，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将接近高收入国家(地区)水平，迎来全面转型和跨越式发展的新阶段。按照国际经验，这一阶段是加速第三产业发展、实现消费结构升级、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阶段，也是金融业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因此，《规划》凸显出浙江省从“金融大省”向“金融强省”的跨越是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然要求，金融发展将成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突破口。

“十二五”时期，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将加快长三角金融一体化进程，我省通过充分发挥浙江市场化机制完善、民间财富集聚程度高、金融生态环境优良的特色，打造浙江金融优势品牌，大力发展财富管理机构和中小金融机构，有效服务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县域经济和城乡居民，有利于实现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错位发展，从而形成良性互动、互惠互利的发展格局。

地方金融发展是地方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在资本自由流动条件下，大企业能够不依赖于地方金融而从本区域之外获得资金来源，但中小企业需要地方金融的支持获得融资来源。因而地方金融发展对于以中小企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的区域尤为重要。

基于此，《规划》提出打造“两个中心”是考虑到浙江经济的主体为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的现实，通过大力发展地方金融，以此推动全省经济快速、健康和平稳增长。“十二五”时期，随着我省产业转型升级的深入推进，部分民间资本将逐步退出高消耗、低附加值的传统产业领域，急需寻求新的投资渠道来提升产业价值链，寻求新型产业来提高增加值，资本的配置模式将进一步向专业化、集约化、高效率转型。而“两个中心”建设有利于促进民间资金向产业资本转化，引导民间资本阳光化，同时提升金融业自身发展水平，使浙江经济率先走上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新路径。

“十二五”时期，随着金融市场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利率市场化改革不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社会大众通过多样化的投资渠道和专业化的财富管理平台来实现资产保值增值、提高社会保障程度的需求会越来越强烈，中小企业多元化的融资需求不断增加。《规划》提出打造“两个中心”，能较好地推动金融产品和工具创新，进一步激发金融机构活力，挖掘和拓展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的深度和广度，完善金融产品结构，也有利于盘活

存量资产，分散经营风险，增强竞争力，还能够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扩大内需，推动浙江从“金融大省”向“金融强省”的跨越。

（作者为省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浙江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链接 “十二五”金融业 发展目标

-金融业发展的贡献率进一步提高。全省金融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15%左右，2015 年金融业增加值达 4600 亿元左右，占全省生产总值和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达 12%和 24%左右，直接融资比重提高到 10%以上。

-银行业发展水平保持全国领先。全省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年均增长 12%以上，2015 年存贷款余额分别突破 8 万亿元和 7 万亿元；争取涉农贷款占比提高到 6%，小企业贷款比重达到 25%以上；不良贷款率控制在 1.5%以下。

-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进一步完善。全省在境内外证券市场上市公司总数达到 350 家左右，新增募集资金达到 1200 亿元以上，上市公司总数继续保持全国前 3 位，各种债券累计发行额占全国同期发行总额的 5%以上。

-保险业创新发展能力不断提升。到“十二五”期末，实现全省保费收入比“十一五”期末翻一番，保险深度超过 4%，保险密度超过 2800 元，产寿险业务规模和增速继续位居全国前列。

-地方金融机构加快做强做大。到“十二五”期末，力争使各类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和金融组织数量明显增加。

-金融生态环境进一步优化。建立有效的金融稳定监测和金融风险预警系统，金融资产质量、经营效益、风险控制水平继续保持全国前列水平。

“十二五”金融业 发展战略举措

-确立“两个中心”的功能定位，构建具有浙江特色的“金融强省”功能支撑体系。

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的功能定位：形成全国领先的中小企业放贷中心功能、中小企业投资中心功能、中小企业直接融资功能、中小金融总部集聚功能、中小企业金融创新功能、中小金融产品交易定价功能。

民间财富管理中心的功能定位：形成全国领先的财富管理机构聚集功能、民企总部金融服务功能、创业投资管理中心功能、产业投资管理中心功能、财富管理服务创新功能。

—加快建设区域金融中心和金融集聚区，构建具有浙江特色的“金融强省”空间支撑体系。

加快建设杭、甬、温区域金融中心城市。把杭州打造成为金融综合实力突出的长三角重要区域金融中心；把宁波打造成为对接上海、服务海洋经济的区域性专业金融中心；把温州打造成为连接长三角和海峡西岸两大经济区、服务民营经济的区域性专业金融中心。

打造一批区域金融特色城市。台州努力形成特色鲜明的民营银行先行区、小企业金融服务示范区；绍兴提升专业化产业金融服务特色；嘉兴成为接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桥头堡和纽带；金华、义乌拓展市场商贸和物流金融领域的区域特色；湖州加大农村金融创新力度，凸显金融服务新农村的示范作用；舟山大力发展海洋金融；丽水、衢州大力推进金融服务均等化。

—着力打造六大金融公共服务平台，构建具有浙江特色的“金融强省”服务支撑体系。

构筑金融机构集聚平台，打造中小金融机构集聚基地和财富管理机构总部基地；

构筑金融资源整合平台，探索组建地方金融控股公司，积极打造资本市场“浙江金融板块”；

构筑金融资产交易平台，建立区域性场外交易市场，探索建立金融资产交易平台；

构筑金融后台服务平台，规划建设金融公共支撑服务基地，设立灾难数据备份中心、金融后台呼叫中心、金融新产品开发、金融人才培训基地等；

构筑农村金融公共服务平台，构建县域金融综合公共服务平台；

构筑投资基金引导平台，创设一批新兴产业投资基金和购并重组投资基金。

（以上摘自《浙江省“十二五”金融业发展规划》）

❁ 史晋川教授央视谈民营企业脱困

2011 年 9 月, 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 (CRPE) 主任史晋川教授, 接受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经济半小时》栏目组采访 (本采访已于 2011 年 9 月 26 日播出), 就近期温州多家知名企业因资金链断裂而倒闭, 企业家失踪这一现象, 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史晋川教授认为, 温州倒闭的中小企业数量, 从企业的绝对数来看并不多, 但是从它倒闭的原因以及倒闭之后这些企业家的行为方式来说, 跟前些年情况有很大的不同, 这是一个需要充分引起注意的问题, 这种征兆已经预示着我们的下一步经济, 尤其是企业可能会向着一个更困难的方向转变。史教授还认为, 温州中小企业陷入困境, 其实暴露出了一系列的问题, 内因、外因兼具, 而根本原因还是来自企业自身, 金融危机时, 温州的企业同样面对困境, 但绝大部分企业并没有对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作出转变, 依旧沿袭着危机前的模式。而后金融危机时代, 世界经济复苏缓慢, 企业在碰到了短期的复苏后, 又碰到了外需不振, 大宗商品价格动荡的一系列问题, 在国内的经济快速复苏的过程中, CPI 的快速发展, 促使国内的宏观经济政策作出相应的调整, 宏观经济的调整就表示着我们的货币政策从比较宽松到稳健, 甚至到适度从紧,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那些企业又碰到生产经营过程当中资金短缺问题, 而这个问题在浙江又特别明显, 中小企业融资难, 这是温州中小企业迈不过的一道门槛。史晋川教授建议, 为帮助中小企业脱困, 在近期应出台相应的财政货币政策, 在中长期应加快金融体制的改革, 进一步鼓励民营资本进入金融领域。

❁ 史晋川教授: 减免小微企业税负 给中低收入者补贴

当前国际经济、国内经济和浙江等区域经济正面临三种不同局面。随着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扩散化, 世界经济面临二次探底的危险局面; 国内通胀预期仍然很高, CPI 维持在 6% 以上; 浙江等区域民营中小企业处于“困局”之中, 由于劳动力成本、汇率、原材料价格不断上涨, 资金紧张, 许多企业生产经营困难, 还出现了“人跑跑”、“钱跑跑”现象。连日来, 针对深陷困境的温州中小企业, 政府正在采取一系列帮扶措施。

其实早在 9 月底,浙江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史晋川教授在出席长三角民营经济高峰论坛时,就已经建议过,中央应改变提高准备金率、加息等反复使用的单一货币政策为主的宏观调控,在货币政策和金融政策上进行结构性调整。近日,史晋川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再次重申其观点:眼下,最有效的是采取一系列财政政策,比如给中小企业减税、给中低收入者补贴,这样既可以提振中小企业生产的积极性,又能鼓励中低收入居民多消费,扩大内需。

民营企业陷危局有深层次原因

早在 9 月底,史晋川教授在出席长三角民营经济高峰论坛时,就发表了题为“危局?难局?困局中的民营企业”的主旨演讲。

史教授分析了国际经济环境和国内宏观经济背景下浙江民营企业的困局产生的深层原因。随着我国经济复苏进程的加速,2010 年起 CPI 不断上涨,通胀预期抬头,我国宏观经济出现了一定的方向性调整,实际货币操作已由适度宽松转向适度从紧,造成实体经济企业的资金困难、融资成本大大上升。我国金融体系是以国有银行、大银行为主的,而浙江等区域的实体经济则是以民营企业、中小企业为主,在所有制和规模方面的双重不对称,导致浙江等地企业在宏观调控下资金特别紧张,民间借贷和高利贷频现,企业因资金断链出现倒闭现象非常突出。这也可以解释温州缘何面临信贷危机。

***经济学奖对现实有什么解释

北京时间 10 月 10 日晚上,2011***经济学奖揭晓当晚,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许小年发表微博,称不应用中国人的眼光看天下事,学术不问现实意义。但作为经济学人,“经世济人”始终是他们的使命。

10 月 11 日晚,史晋川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媒体不妨关注***奖对现实有什么解释。本届***经济学奖获奖人之一萨金特是理性预期学派领袖。放到政府层面,理性预期对政府出台何种政策、什么时候出台政策极具借鉴意义。

政府通常用相机抉择来处理问题,比如经济衰退时期,为刺激经济,政府会推出扩张性货币政策。这时,企业家会认为消费水平提高,愿意扩大再生产;工人预期工资会提高,会愿意提供更多的劳动力;消费者也是如此。这是常规的预期。短期来看,这样做是有效果的。但从中长期来看,货币政策是中性的。单一使用货币政策会力不从心,就需要财政政策一起给力。

为中小企业减税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

在危局、难局下如何破解企业困局?史晋川建议,应对政策应该是:

一、短期政策调整。一是货币政策。建议改变准备金率、利率等反复使用单一的货币政策工具,使实际货币操作真正回归“稳健”的货币政策,特别是要在货币政策和金融政策上进行结构性调整,使得民营中小金融机构能够在货币政策中有更为宽松的环境,使其能够更好地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帮助中小企业渡过当前的难关并在未来开展自主创新。二是财政政策。当前我国财政收入增速远远高于 GDP 增速,如一季度全国 GDP 增速为 9.7%,而财政收入增速高达 33.1%,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建议对中小企业减税,帮助其“脱困”,鼓励其进行新的投资;对中低收入居民减税,鼓励消费,扩大内需。

二、长期政策取向。一是鼓励民营资本、民营企业更多地进入金融领域,创造更丰富的金融生态。二是打破垄断性行业的准入限制,鼓励民营企业进入新的产业领域。三是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市场竞争秩序的维护和规范,鼓励企业开展自主创新。四是推进新型城市化,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增强优势区位空间的要素集聚能力,加快形成高端的生产要素保障体系,更好地为企业自主创新、转型升级提供要素保障。

(来自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公司))

❁ 史晋川教授：如何“升级温州”

记者/任蕙兰

转型升级所需要的资本、技术、人才投入，一些实力薄弱只求生存的企业望尘莫及，而在宏观政策从紧的环境下，转型升级变得更加艰难。

有人说，温州模式正在经受煎熬。上世纪 80 年代，有关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孰优孰劣、姓资姓社的讨论席卷全国。温州地区放手发展以市场为导向的民营经济，费孝通归结为“小商品，大市场”。与此同时，江苏南部的苏州、无锡、常州等地区通过发展乡镇企业集体经济为主，实现非农化发展。

最初苏南模式备受推崇，温州模式被贬斥为“无序”，但随着改革开放深化，受到利益直接驱动的温州企业活力十足，风头十足。

温州模式曾是市场经济的一面标杆，但在 1997 年十五大之后，全国各地都在提倡和鼓励发展私营经济，意识形态的争论弱化，温州的制度优势开始缩小。温州一直在吃改革老本。几十年来温州的产业结构基本局限于低加工度和低附加值的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例如皮革制品、服装、塑料制品和打火机等，制造业的结构演变缓慢。温州经济增长方式停留在低成本、低价格的传统模式上，显然缺少发展后劲。

领跑者被甩在了后面。早在几年前，温州已经从浙江乃至中国最先进的城市，滑到人均 GDP 在浙江省倒数第二名的地步。反思温州的声音此起彼伏。

史晋川教授对温州模式的批评曾引起学界的广泛讨论。他指出，温州人的交易方式和商业模式是人格化交易，影响温州对外开放。温州的公共权力和私营经济之间可能已经织成了一张“不可触摸的网”，阻碍着投资者的进入。他预言“现有的温州模式将被更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规律的方式取代”。

10 年来，温州一直在喊产业调整的口号，提出培育新兴产业，鼓励企业转型升级，改变原来的增长方式。但温州产业结构几十年未曾改变，在金融危机以前，温州 70% 的企业都有外贸订单，日子过得滋润，一直以来没有压力和危机感去转型。

2008 年金融危机发生后,温州人真正意识到,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都鼓励企业走上转型升级的道路,提升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应对复杂的国际环境。而这次温州企业遭遇的危机无疑是对盲目扩张升级敲响的警钟。

转型升级所需要的资本、技术、人才投入,一些实力薄弱只求生存的企业望尘莫及,而在宏观政策从紧的环境下,转型升级变得更加艰难,温州眼镜龙头企业信泰集团正是在试图升级转型的过程中资金链断裂。

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认为,小企业当务之急是走向联合,行业领袖应以自己的资本、品牌甚至销售渠道去整合一些行业里的小企业,在联合基础上形成一个大型企业,实现资源重新组合和配置,增强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当企业形成一定积累,才有力量谈技术和品牌的提升,走向升级转型的道路。

传统制造业转变的另一个方向是资本经营。从几年前开始,温州实体经济利润大幅下滑,大量资金涌入投机领域,炒房、炒矿、炒大蒜、炒棉花、炒白糖、炒中药……温州商人的身影出现在各个行业。很多人认为,温州此次的高利贷危机,不是单纯的实业经营的危机,而是楼市调控和打击恶意炒作农副产品等带来的投机危机。

房地产限购和山西煤改导致一批温商财富蒸发,一些温州企业开始转向股权投资。但据业内人士透露,真正操作规范的不多。“股权投资在温州本地目前较缺乏专业团队,光有资金是很难运作的,如果把大量的资金集中投在某个项目中,没有专业的眼光和管理,风险很大。”温州九星资本上海子公司,九星大展商务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李青表示。

温州经济折射出中国制造业的困局,转型升级之路将何去何从?《新民周刊》专访了浙江大学经济学教授史晋川。

新民周刊:温州企业之间大多实行互保,一个企业倒闭,往往会连累一批互保企业,风险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扩散,这是不是温州人格化交易方式造成的结果?

史晋川:民间以各种“会”的形式出现的金融,最早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它的资金用途是消费型的,第二个是它的合约执行,就是还不还钱的信誉保障,是熟人圈子里的人格化交易,就是以个人信誉为担保的。现在它为什么会出这么多问题?是因为它前一个特点改变了,后一个特点没改变。原来是资金用途是消

费型的,现在是生产型的。生产型又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资金数量比较少,筹资直接投入实体经济,比如办一些家庭企业等。现在是规模比较大的生产型企业,规模大了以后当中有一部分人开始做资金生意,他的资金走向已经不是在生产领域,而是再贷给别人。也就是说原来是在做实业投资,现在对一部分人来说是在做金融投资,资金可能要转好几手,再到做实业的人那里去。

现在一是资金用途发生改变,二是资金规模变大,三是借贷的链条拉长了,在这种情况下,它的合约机制并没有发生改变,还是人格化的交易,这就会出问题了。原本是大舅、姑姑投钱一起做一项生意,现在借贷链条拉长后,亲戚的亲戚,甚至很多不熟悉的人全部进来,这就意味着参与民间融资的人,人数上越来越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松散,离熟人社会人格化交易产生的最初情况越来越远。也就意味着人格化交易机制对民间借贷合约执行的保障越来越弱了。在这种情况下很显然,风险就在不断地放大。一出事就会产生连锁效应。为什么温家宝总理讲民间金融要阳光化?阳光化重要的一点就是规范化,所谓规范就是现在的金融活动它的合约机制不应该过多地依靠人格化交易方式,而是要建立在法律基础上,向现代非人格化交易方式转变。

新民周刊:信泰集团很早就开始进行产业升级,创立自有品牌,控制零售终端,并积极进军光伏产业,但并没走出一条成功道路,最终资金链断裂。目前温州出现的一些问题会不会阻碍温州制造业转型升级?

史晋川:现在温州企业转型升级的金融制度环境、金融保障环境是比较差的,一个企业要转型升级,肯定是要投入的,你到什么样的平台上融资?如果我们有比较好的平台做融资,比如说私募股权投资,相对来说你的风险就会减小,因为做 PE 的人也会很仔细地来看你的项目可行性,不会随随便便往你这里投钱。但是现在这种新的融资工具融资平台比较少。这种融资平台的缺失导致民营企业通过其他途径融资,到民间借贷市场,这样风险就比较大。现在中小企业面临转型升级,应该有一些好的融资渠道,这些融资渠道和平台能够把大量分散的中小企业的产业资本集聚到一起,再去反馈产业,去促进帮助中小企业转型升级,而目前温州金融环境并没有这样好的金融支撑。

新民周刊:人民币不断升值,受通货膨胀影响原材料、能源和土地涨价,劳动力成本和环保成本增加,以及针对出口的税收优惠越来越少,据说目前温州中

小企业平均利润只有 1%到 3%，发展低加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模式是不是走到尽头？

史晋川：温州出现这么多问题，总体上来说，企业转型升级的步伐比较慢。2008 年金融危机，国家出台 1.18 万亿带动 4 万亿的一揽子庞大投资计划，当时在短期中缓解了企业的困难，流动性充分释放帮助企业在比较短的时间里度过金融危机冲击的难关，这就导致我们这些企业没有在金融危机冲击下形成一种倒逼机制，逼它转型升级。在一个比较宽松的，流动性释放比较充分的反危机前提下，绝大部分企业还是沿用了原来的生产经营方式，搭乘整个中国经济复苏的列车，好像暂时松了一口气。当国内宏观政策一转向，企业碰到的问题还是危机前碰到的问题。国际经济复苏很慢，震荡很多，国内经济复苏太快，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开始转向，企业本来应该在金融危机中做的转型升级没有做，无非是问题往后延了，在新的国际和国内宏观环境下这些问题又暴露出来。

新民周刊：现在的环境是不是比 2008 年金融危机更严峻？史晋川：现在外部环境比 2008 年的问题更严重，2008 年企业面临的问题是订单，企业接不到订单，现在订单并不是最主要的问题，主要是企业自身的问题，第一它没有很好地做转型升级，所以遇到很多困难，第二它遇到很多困难后，部分企业家对实体经济就失去信心。经常有这样的情况，企业家一个厂做几年利润不如他老婆炒房子赚得多。一旦失去信心，一部分企业就会把资金从实体经济转出来，转到民间借贷市场上去，实体经济自身的问题并没有解决。还在实体经济坚持的那部分人，觉得我只要有资金就可以度过难关，也不去转型，转向民间借贷，实际上就是在没有很好转型情况下，货币资本资源配置的错位，导致这么一个局面。

新民周刊：近年来很多企业已经开始动脑筋从事资本经营，做股权投资，对接民间资本与项目，这是不是一条出路？

史晋川：温州金融环境的改善有几点，一是让更多民营企业进入这个领域，但要是大的，应该是中小型民营金融机构。假设民营企业缺水，你如果建一根大管子，肯定就不对着中小企业了，要建很多小的管子，每一条都可以对着中小企业，因为现在中国的金融体制，尤其是在浙江、在温州，这种双重的不对称是非常严重的，金融环境是国有银行、大银行占主导，但面对的实体经济里是民营中小企业占主导，双重不对称使得中小企业融资非常困难。在中小企业融资困难

的同时,又有数千亿的民营资本没有出路,所以中央应该把温州作为金融创新的实验区,降低中小金融机构的进入门槛,它们面对的是实体经济里的中小企业。

第二个是除了间接融资的渠道,应该开通直接融资的渠道,除了私募股权投资以外,也可以考虑私募债券投资,温州人本来已经不愿意做企业了,股权投资不还是做企业吗?私募债券投资也可以考虑,就是说我们对温州环境的改善,金融生态的丰富,不仅在间接融资上下功夫,也可以在直接融资上多考虑。

各方“会诊”民间借贷

在宏观调控日益趋紧的背景下,差钱是全国性的现象,持续的银根紧缩导致社会资金大量“脱媒”(体外循环严重),导致市场利率与央行基准利率偏离度越来越大,高利贷已经公开化、合法化,甚至一些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都在放变相的高利贷。民间高利贷从来没有这样猖獗过,如果泡沫吹得太大,其破灭将造成相当大的冲击。

《中国证券报》

在曾经繁荣的沿海城市温州,许多企业倒闭,留下一摊子债务。最纠结的是,持有坏账的不是银行,而是另一些企业主,富人们为了让“钱生钱”,以高息把钱贷给企业……20 多年经济高速增长伴随着大量财富涌入中国,但吸纳这些资金的投资渠道扩张速度却缓慢得多,因此从房地产到大蒜、绿豆各个领域涌现出投机泡沫。现在,中国股市处在深熊市,房地产价格开始下滑,特殊的投机游戏比如高利贷也陷入麻烦,中国投资者感受到和外国同行一样的痛苦,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寻求避风港面临的挑战更大。

英国《金融时报》发生在中国温州中小制造业的麻烦给中国核心经济投上一层阴影……中国采取紧缩货币政策是为了遏制通胀,部分原因是金融危机时庞大的经济刺激计划导致的。但银根紧缩加重了私体经济的压力,人们开始担忧中国经济将会回落,坚挺的中国经济一直在欧洲和美国经济陷入疲软时起到平衡的作用。

美国《华尔街日报》

这一轮民间借贷风潮有不寻常之处缺钱的很可能并不是实体经济,而是货币市场。由是观之,这轮民间借贷风潮的兴起便具有了普遍、盲目和投机的特点,而这无疑是虚拟经济的最爱,也与近年来中国经济的虚拟化倾向吻合……如果说疯狂的民间借贷是因为经济波动下中国紧缩政策带来的副作用,那么对此的担忧将是短暂的,适时的政策调整即可缓解压力;但倘若民间借贷的兴盛是由于中国投资虚拟化与投机化加深,那么警钟将不仅仅是响给那些“跑路”的温州企业主的。

法国《欧洲时报》

(全文来自搜狐网)

❁ 史晋川教授：温州民间危机莫重演

新城财经台多媒体频道《点金大中华》

播出时间：逢港股交易日下午四点三十分

主持：高亚雯张晋文炳森陶沙张冰洁

本期嘉宾：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史晋川教授



货币紧缩能否压下通胀的火,还没到下结论的时候,但是池鱼效应早已显现。民营经济发展最早、最繁荣的温州,频频上演贷款「断炊」、老板「跑路」,甚至连总理温家宝都要趁国庆亲自巡查。民间金融的灰色链条牵动了谁?危机能否从实质上推动改革?本期节目请来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史晋川教授,拆解温州危机的点与面。

点：温州民间借贷为何成为本轮危机焦点？

史：温州私人中小企业比较多，资金需求也较为旺盛。历史上温州一直属借贷活动活跃地区，组织形态发达。温州之所以成为焦点，一是民间资本发达，市场资金供需规模均较大，温州民间资本规模约 8000 亿（人民币，下同），需求

也有千亿；二是个别极端案例，比如无力偿债的企业家跳楼、跑路，引发强烈社会关注。

温州这十多年来制造业格局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基本局限于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如皮革、服装、打火机等。作为沿海开放 14 个城市之一，温州却极少有温州以外的人来创办和经营企业，温州的“外企”基本是持外国护照的温州人的企业，风险集中。

点：温州的信贷爆发与之前有何不同？

史：最开始的温州民间金融，基本局限在消费领域，涉及金额小，人数少。前些年爆发危机的企业，产值基本在百万到千万，借钱也多作周转、应急之用，但目前已扩展到了生产领域。这次借贷危机，基本出现在 4700 多家的中型企业，这些企业的产值均过亿甚至十几亿，资金需求大很多。尤其要留意的是，中型企业之间相互担保，一间破产必将波及其它，这次危机波及的范围与严重程度都超过以往。

点：企业间如何担保？

史：现时内地银行体系中，纯粹的信用贷款是比较少的，一般需要抵押或者需要其它企业担保。例如 A 企业需要借资 1 百万，这时如果自身的抵押物不足，就需要其它企业进行担保，也就是说，A 企业如果不能偿还贷款，那么担保方 B 企业就需要替其还款。

点：本次参与温州借贷的资金链条的参与方又有哪些？

史：本次涉及的借贷方复杂得多。一般情况下，民间借贷仅为借、贷两方面，即企业与中介，但现在有大量出借方充当中介的角色，环环相扣。比如说，一个民间借贷公司拥有 5 亿资金。但是这些资金来源非常分散，有好几个吸收了几千万或者上亿资金的个人或者组织，这些组织的资金来源则是更分散的个人和小型组织。供款方的链条比以往都要长，一旦出现问题，牵连范围会很广。

点：可否解释担保公司的功能？

史：这次危机的资金链条很长，尤其是中小金融机构非常活跃，比如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他们连通了银行和民间资金，运作非常灵活，给出的利率比银行还高，银行可贷资金减少，还要问担保公司要钱。担保公司给企业贷款做担保的时候，银行还要求担保公司也要拉一定的存款，不然不批贷款。

点：银行在这场危机中扮演了甚么角色？

史：很难简单地给银行的做法下一个定义，但可以肯定的是，部份银行的不合规的做法，在这次金融危机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放大了整个金融危机的后果和不良影响。央视披露一个制鞋企业的倒闭过程，公司需要向银行贷款，银行说必须先存款才能贷款，于是公司在高利贷市场上贷到钱、存到银行去，再从银行得到相应贷款，这种情况短期暂时缓解这家企业资金链的状况，但实际上把风险延后了，还牵涉到了银行贷款，等于放大了风险。据我了解，几乎所有的银行都有违规吸纳存款的现象。

点：温州危机怎样才能保证不再重演？

史：这取决于两点，一是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如果在对民营的中小机构的准入方面更加开放，在金融监管方面更加有效，在利率的市场化方面能够进一步推进，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取决于民营企业自身的转型升级，他的自主创新能力，转型升级的步伐。只有从金融和实体经济两个方面，都进行相应的改革发展，才有可能从长期解决民间借贷的金融风险问题。

点：利率市场化，您觉得什么时候能看到？

史：温家宝总理 10 月视察温州后，已将温州列入金融改革实验区，我从去年 10 月开始也在参与改革方案的制定，现在浙江省政府已经通过，并提交国务院有关部门。危机之后，我相信推行速度会加快。市场也关心借贷利率 4 倍的上限能否突破，我反倒认为这并不是太核心的问题，应该推进存款利率市场化的方向，由市场供求机制来决定资金价格。

史晋川：求解温州金融风险

近期，温州企业家由于身陷民间借贷的高利贷，出现了一连串“跑路”事件，引起了国内外的诸多关注。加上内蒙古鄂尔多斯和江苏部分地区的民间借贷引发的债务危机，使得中国的民间金融市场，尤其是“高利贷”成为众人瞩目的话题。

但目前在各界对温州民间借贷的质疑、抨击甚至肯定声中，民间金融中借贷双方的合约执行机制与民间借贷活动的金融风险两者的内在因果性，却鲜有人从经济理论层面进行认真分析。

人格化交易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历史比较制度分析学派代表人物阿夫纳·格雷夫在研究地中海地区商业历史时，曾深入研究了当时地中海地区的两大商人群体——马格里布商人和热那亚商人。

在当时地中海地区的航海贸易中，信奉集体主义的穆斯林马格里布商人利用熟人关系组成的社会人际关系网络，建立起以多边声誉机制和多边惩罚机制为特征的人格化合约执行机制；信奉基督教的热那亚商人则借助法律和法院，建立起以双边声誉和双边惩罚机制为特征的非人格化合约执行机制。简言之，马格里布商人是用地缘、血缘、亲缘的“三缘”关系来保证合约的执行，热那亚商人则运用法律保证合约执行。

笔者 2003 年曾用历史比较制度分析的理论，研究了温州经济的历史发展趋势，指出温州商人和企业家大多身陷人格化交易方式，利用人格化合约执行机制来从事经营活动，这可能对未来温州经济的发展和温州人经济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此次温州由于企业家身陷民间借贷引发的“跑路”事件，再次证实人格化交易方式及人格化合约执行机制对温州民间金融市场的负面影响。温州民间金融市场中金融风险集聚和爆发的一个根本性制度原因，就是民间金融市场曾赖以有效运行的人格化合约执行机制，在新的经济发展阶段，无法保证民间金融市场的合约有效执行，从而导致民间金融市场风险的集聚和大规模爆发。

回顾温州民间金融活动历史可发现,温州各种民间金融活动形式,例如“抬会”和“标会”等,资金的使用主要用途是消费,同时也有少量小本商业经营。相应的,每一次组“会”的募集资金规模都较小,资金募集对象的人数也较少,出资人之间的“三缘”关系较密切,资金的使用者往往也是出资人,民间金融的融资类似是一种直接融资方式,且资金的使用处于关系密切人群的视线内,资金的供求双方信息较对称。

因此,人格化合约执行机制能比较有效地保证合约履行,防范民间金融风险发生。

温州模式缺陷

改革开放后,温州的民间金融活动在支持民企的发展中,曾发挥了很大的积极作用。但随着民企和区域经济的发展,民间金融活动的人格化合约执行机制,已开始暴露其自身问题,导致潜在的区域金融风险加速聚集。

首先,民间金融活动的资金需求发生了变化。资金的用途不再是以消费和小本商业经营为主,绝大部分民间资金是作为企业的流动资金,甚至是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资金用途的变化使得民间金融活动的资金募集规模迅速扩张,民间金融组织的单笔融资规模随之急剧扩大。相应地,由于民间金融组织内部融资规模的扩大,资金募集对象的人数也迅速增加,出资人之间的“三缘”关系相应地趋于松散。

更重要的是,在迅速扩张的民间金融市场上,绝大部分出资人已不再是资金使用者,出资人逐渐演变为单纯的资金供给者,最终的资金使用者与出资人几乎没有密切的“三缘”关系,而只是与资金募集的发起人有相应的借贷合约关系,民间金融的融资方式由此演变为间接融资。

民间金融市场发展到这一步可看出,人格化合约执行机制与其所面对的民间金融市场中的融资方式和合约主体已经开始发生错位。单笔融资的资金规模越大,出资人之间的“三缘”关系越松散,出资人与最终资金使用者之间的关系越远,人格化合约执行机制就越不能有效地保证合约履行,民间金融市场聚集的金融风险就越大。

一旦出现某些内外因素交织的社会经济冲击,区域中大规模的金融风险就会爆发。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见的温州民间金融市场合约执行机制导致金融风险集聚和金融风险最终爆发的内在机理。

民间金融合法化

坦率地说,我们现在所听到的许多对温州民间金融的意见大多属“隔靴搔痒”的论调。

金融业是一个契约密集型的行业,民间金融的健康发展需要根本上的制度建设,用法律制度来保证合约的有效执行。因此,制度建设的核心是在金融市场上用以法律为基础的非人格化合约执行方式来替代传统的基于“三缘”的人格化合约执行方式。

目前,银监会有关民间金融借贷合法化的说法引起各方反响。媒体的解读似乎把“合法化”简单地理解为原先不许做,今后可以做,而不是理解为在民间金融市场从事民间借贷活动要“合乎国家法律法规”。笔者倾向于从后一层意思来理解合法化。民间金融的借贷要合法化,先要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再利用法律法规去规范民间借贷活动。

具体说,首先,民间借贷合法化的当务之急是尽快出台《借贷人管理条例》,明确受国家法律保护的民间借贷主体,以及民间借贷活动范围和民间借贷活动方式,将民间借贷活动纳入法律规范。

其次,国家应在加强金融监管的同时,进一步降低组建小额贷款公司的门槛,鼓励民间资本通过组建小额贷款公司来从事借贷活动。

在笔者看来,在出台有关扶持发展民间金融的法律法规过程中,必须严格区分两种不同的民间借贷活动:一是用自己的钱作为借贷资金从事借贷活动;二是不仅用自己的钱,同时还用了别人的钱作为借贷资金从事借贷活动。前者不涉及吸收民间储蓄存款,后者则是一种从事吸收储蓄存款的活动。

民间借贷的立法,应把民间借贷活动严格限制在不涉及吸收储蓄存款的借贷活动范围内,同时严禁民间非法吸储活动。对于涉及吸收储蓄存款的民间借贷,应通过鼓励民间资本组建小型商业银行或合作金融组织加以规范发展。

不同的金融活动，应由不同的金融组织承担，用不同的法律规范，这样才能在提高金融效率的同时防范金融风险。此外，在通过法律规范民间金融借贷活动的同时，对于民间金融市场的资金价格——利率的管制也应相应放松，更多地让金融市场的供求关系来调节金融市场的运行。

来源：《财经》

🌸 史晋川教授：浙江从“放水养鱼”到“放鱼养生”

浙江经济形势正面临新的考验。

浙江省政府经济建设咨询委员、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史晋川教授近日在接受《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预测，明年中国经济增长目标可能下调到 8% 以下，经济趋势将下行，而浙江下行速度有可能更快。

从 GDP 增幅来看，三季度全国 11.9% 滑到 9.4%，浙江同时段下滑 5.4 个点；从通道变化来看，外贸需求下滑也在所难免；投资增长方面，浙江也比全国低，且大部分是房地产投资；消费结构方面，浙江也在丧失先机。

不过，史晋川认为，浙江区域经济整体稳定。浙江全省 217 家大型企业、2000 家中型企业、27000 家规模以上小企业和大约 170 万家微型企业，今年 1-3 季度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2%，而小微企业增幅达 20%。

“浙江经济整体稳定”

《21 世纪》：你 9 月份以来多次到温州调研，当地整体形势如何？

史晋川：温州整体形势并未出现“崩盘”。前三季度，温州规上工业企业总产值 3106.87 亿元，同比增长 14.8%，工业产品产销率 97.0%；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97.1%，新开工项目增多；进出口运行良好，同比增长 30.6%，其中出口增长 29.5%。

浙江企业利润率还不错，前三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利润率 21.2%，但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只有 5.73%，目前工业企业、生产性企业的形势比较严峻。

《21 世纪》：温州民间融资的利率问题，外界讨论得比较多。那么，上升幅度到底有多大？

史晋川：原来的利率是一分利（年利率 12%）到两分利（年利率 20%）之间，现在已到两分利以上。中小企业从金融机构融不到资，被迫转向民间借贷，导致财务成本急升。

浙江省统计局数据显示，1-9 月全省规上工业企业净利息支出同比增长 36.0%，小型企业利息支出同比分别增长 46.6%，远快于同期银行贷款增长。

企业流动资金也日益收紧。据 9 月末对全省 4653 家大中型工业企业专项调查，三季度流动资金缺口 20%以上、10%-20%和 10%以内的企业产值分别占 3.0%、10.0%、20.2%，合计占 33.2%，比一季度和二季度分别提高 8.1 和 0.8 个百分点。

《21 世纪》：民间借贷的运作模式发生了哪些变化？

史晋川：首先，资金需求发生了变化。资金用途不再是以消费和小本商业经营为主，转而作为企业流动资金，甚至用于固定资产投资，从而导致资金募集规模迅速扩张，募集人数迅速增加，出资人之间的“三缘”关系相应地趋于松散。

其次，直接融资变成了间接融资。绝大部分出资人演变为单纯的资金供给者，资金使用者与出资人几乎没有“三缘”关系，而只是与发起人（高利贷具体操盘者）存在借贷关系。

一旦出现某些内外因素交织的社会经济冲击，例如信贷政策从紧，以及温州大规模拆违导致众多小微企业工期受限等，就容易激发区域内大规模的金融风险。

《21 世纪》：你认为温州模式是浙江经济的缩影吗？

史晋川：在温州乃至浙江，投资、就业、出口及税收等主要经济指标，90%以上均由民营企业完成。浙江市场化程度相当高，其前店后厂的产业集群雏形和“内部人交易”模式可以做到成本最优，所以在经济收缩期损失一些，哪怕是倒闭一些企业，也不可能站不起来。

《21 世纪》:但浙江省统计局数据称,1-9 月全省规上工业企业亏损面 12.8%,亏损企业同比增长 28.6%,亏损额增长 37.0%;总资产贡献率 12.4%,低于全国(15.4%)、山东(22.0%)和江苏(14.7%);资产负债率 61.5%,高于全国(59.1%)、山东(56.1%)和江苏(59.0%)。这是否表明,浙江正在远离中国经济第一方阵?

史晋川:某一个短时间段的数据,其样本价值有限。从亏损率来看,1-9 月浙江省比全国的 7.6%低 2.4 个百分点,居全国第六位,比江苏、上海和广东分别低 0.4、2.1 和 3.4 个百分点。

我认为,浙江区域经济整体稳定,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基本健康。

从“放水养鱼”到“放鱼养生”

《21 世纪》:自 2003 年宏观调控以来,民营经济就一直面临各种要素制约,为什么今年困难特别突出?

史晋川: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国家出台 1.18 万亿带动 4 万亿的一揽子投资计划,在短期内缓解了企业的困难。绝大多数企业没有注重生产经营方式的调整和转型,就渡过了危机。

而今年受欧洲债务危机以及全球经济下滑风险加大等不利因素影响,企业库存压力增加。9 月末,浙江省规模以上工业存货同比增长 25.7%,其中产成品存货同比增长 30.1%,增幅分别比去年同期高 4.9 和 23.6 个百分点。

从历史经验看,库存高企意味着工业需求缩小,拉动工业增长的动力减弱。

《21 世纪》:三年前,有人说不转型升级是等死,主动转型升级是找死。现在该怎么办?

史晋川:如果不转型升级,是立马死,主动转型升级,可能死,但活下来的会更好。

比如杭州的一家建筑企业,4 年前改做动漫,从二产跳到了三产,现在成了中国动漫出口最好的企业;玉环一家节能灯企业,2005 年起转做光伏产业,第二年股票在伦敦创业板上市,2010 年产值达 20 个亿。

2008 年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向我国转移的不仅仅是制造业，还有产品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等。6 年前，义乌某企业做 OEM，半打袜子卖 13.99 美元、赚 2 美元。现在做 ODM，半打袜子卖 17.99 美元、赚 5 美元。

《21 世纪》：但广大小微企业首先要活命。

史晋川：这需要地方政府转变观念。各地都在招商引资、扶优扶强，地方政府和银行联手“垒大户”，而小微企业生存状况恶化。以金融信贷为例，超过 90% 的中小企业无法从银行贷款，政府和银行谈何支持？

过去没有鱼，浙江的经验是放水养鱼，现在养出了 200 万家各类民企（含专业市场）大“鱼”，应该是放鱼养生的时候了。

《21 世纪》：你最近多次呼吁减税，动机是什么？

史晋川：今年一季度以前，央行为了控制通胀，频繁上调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12 月 5 日起，央行下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 0.5 个百分点，这也是三年来首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但我认为，在 CPI 指数仍高于 5%，且全年通胀控制目标超出年初预期的情况下，此举对巩固物价控制的成果是不利的。

我认为，所谓“下调”可释放部分流动性、增加银行放贷支持实体经济的说法是一个悖论。以四万亿为例，民营企业获得了多少资金支持？

而随着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成本推动型、输入性的通胀和结构性通胀的影响在逐渐加大。在这种形势下，不要单纯地频繁地使用货币政策，可以采取一些政策组合，比如调整汇率、减免税费、给中低收入者补贴，促进投资和消费，扩大内需。

《21 世纪》：近年来，你多次呼吁关注一些竞争性领域的“国进民退”问题。为什么？

史晋川：毋庸废言，垄断和行政壁垒在中国仍有市场，它们只能促成封闭的经济发展，阻碍社会创新，必须进一步改革开放突破垄断限制，更需要一套综合的国家竞争政策框架，保证整体经济的长久活力。

在财政政策方面，应该进一步深化税制改革和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例如，物业税（房地产税）的开征将为地方政府提供一个稳定的收入来源，有助于减少政府行为的短期化倾向。

《21 世纪》：很多舆论在呼吁放开民间融资渠道。你怎么看？

史晋川：要进一步开放金融领域，必须改变现有的垂直型监管体系，变成分级监管。地方小型金融机构的审核权限要下放给地方政府，不要把所有的审批权都归总到银监局。银监局的监管往往就是老思维，给各省分配指标。

《21 世纪》：在长期政策取向上，你有哪些建议？

史晋川：一是鼓励民营资本、民营企业更多地进入金融领域；二是打破垄断性行业的准入限制；三是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市场竞争秩序的维护和规范，鼓励企业开展自主创新；四是推进新型城市化，加快形成高端的生产要素保障体系，更好地为企业自主创新、转型升级提供要素保障。

（摘自《21 世纪经济报道》2011 年 12 月 15 日第 7 版）

🌸 《深圳特区报》专访 CRPE 主任史晋川教授

中小企转型亟需金融滴灌系统——和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史晋川的对话

核心提示

以地缘、血缘、亲缘为基础的人格化交易，是中国民间资本流动的主要模式，也是温州民间借贷风波的制度性原因。随着民营经济发展，曾造就了温商繁荣的“温州模式”是否需要大变革？小企业未卷入“跑路”风波，正转型升级的大企业却深陷其中，民企转型困难何在？扩大民



间资本市场准入，难度为何如此之大？针对以上热点问题，记者日前采访了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史晋川。

■ 深圳特区报记者 谭德波

1、浙江中小企并无倒闭潮

深圳特区报：您多次表示，温州中小企业并不存在倒闭潮。这和外界直观印象好像有很大差别，怎么讲？

史晋川：目前，浙江约有 20 多万家企业，金字塔最顶端有近 220 家大型企业。接下来有 1800 家左右的中型企业，27000 家左右的规模以上的小型企业，以及 18 万家规模以下的微型企业。这次出问题的 200 多家基本上集中在 1800 家中型企业中，小微微型企业的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 1-3 季度比往年还稍微好一点。

“温跑跑”现象的出现，主要集中于转型升级“走得太急”，进入新行业太快的企业。温州一家非常知名的眼镜企业这几年一直在转型，直接进入新能源，做多晶硅和单晶硅，由于近半年来太阳能行业开始萧条，加上国家货币政策趋紧，资金链断裂。一些民营企业转型升级的愿景应肯定，但步伐迈得太快，特别在新领域中不够谨慎。在我看来，这类企业除了自身因素外，地方政府和银行也有责任。

深圳特区报：地方政府和银行有何责任？

史晋川：国内一些地方政府，这几年都在鼓励企业转型升级。管理部门一看到成规模企业在做新材料、新能源就开始鼓励，银行在这种情况下也愿借钱，在他们眼中，做转型升级、进入新能源和新材料行业，就是有战略眼光。正泰集团的南存辉在 2009 年进入光伏产业，信泰集团的胡福林也是一样，本来是“眼镜大王”，但两年前银行主动找他贷款，鼓励他进入新兴行业。转型过程中出现问题，企业自身固然占主因，但地方政府和银行也有责任。企业资金规模本身只有那么大，进入新领域后根本掌控不了发展局面。

深圳特区报：除了因转型而误入歧途，“跑路”企业还存在哪些问题？

史晋川：第二类是没有准备转型升级的企业，之前的“老问题”引发危机。这些企业实际上在 2008 年金融危机前后就已碰到问题。所谓“企业头上五把刀”，包括劳动力成本提高、原材料成本上升、电力紧张、贷款紧张、汇率上涨等。2009 年，企业搭着经济复苏的列车又过了一段好日子，但“老问题”并没解决，现在政

策趋紧，好日子便到头了。第三类是对原有行业失去兴趣，从实业中抽出了资金，到民间借贷市场上赚快钱，或投到楼市。当民间借贷资金链出问题，市场不景气，企业只能倒闭。总体而言，温州并不存在中小企业倒闭潮，主要是有一定规模和资金实力的企业在转型升级过程中迷惘，资本配置流动失去方向。

2、温州模式八年来变化大

深圳特区报：早在 2003 年，您就在公开演讲中表示，民营企业的温州模式将有所改变，这八年来有变化吗？

史晋川：温州模式这八年已在变，但向不利方向的变化，比向好方向的变化要多一些。为什么？温州民间借贷最开始是标会，是消费型的，资金规模小，同时人数较少。这意味着资金筹集和使用的人际关系圈子很紧密，地缘、血缘、亲缘为基础的人格化交易方式，能在民间金融活动里起到保证合约执行的作用。但现在的民间借贷用途已不是消费，而是生产，资金使用规模扩大，不再是几十万、几百万，而是至少几千万、甚至几亿，筹集和使用圈子里的人际关系就非常疏远，人格化的交易方式根本没有办法来保证合约执行，问题就出来了。这就是导致温州民间借贷出现这么大的风险，产生这么大的影响的制度性原因。

深圳特区报：您觉得温州未来的路是什么样的？有专家认为，是变成 PE 注册中心，成为资本输出地，还是产业升级，或者还有别的路，怎么看？

史晋川：2010 年下半年，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等领导非常关注温州金融创新方案，提出温州应做地方金融创新，特别在一些制度上做改革实验区。我认为，温州应从城市、产业、金融三方面来做。首先，温州城市化建设落后，导致吸引和积聚要素的功能没有发挥出来。一个地区要转型升级和自主创新，要有新的要素和新的要素配置方式，特别是一些高端要素的积聚，没有很好的城市化是做不到的。温州的城市化不是为城市化而城市化，而是为了积聚要素促进转型升级。

第二是产业转型升级能不能围绕一些大企业进行。大企业输出品牌，研发技术和新产品，然后构建现代营销网络，大量小企业来做加工和服务的外包。这几年，义乌围绕着梦娜、浪莎等企业已形成以大企业为主，中小企业加盟外包的“现代产业集群”模式。像浙江的低压电器、服装、袜子行业，大企业自产比例仅为 30%到 40%，而 60%到 70%是小企业生产的，大企业把精力放在研发和品牌上，这一点温州也可以借鉴。

3、及早建立金融滴灌系统

深圳特区报：民间借贷摆脱这种人格化交易模式，有什么更有效的模式？

史晋川：温州应建立和产业转型升级契合的金融平台，把分散的产业资本集聚到新的金融平台，再反馈到产业里去。中小企业融资难，因为银行是大银行，贷款企业是小企业；银行国有，贷款企业是民营，这就决定了融资难。我不赞成在温州搞比较大的金融机构，应鼓励民营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建立更多的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或者一些小额贷款机构。不能用很粗的水管去浇灌细苗，应滴灌，建立一个金融的滴灌系统。同时，在监管上应加强监控，但最好是中央和地方两级监控，比如区域性中小型金融机构，审批权、监管权都放给地方，跨地区大型金融机构则仍由中央监管。监管力度不能放松，监管跟不上去，银行风险会增多。

深圳特区报：民间资本积累起来多数用于放贷，一个原因是缺乏投资途径。大家呼吁放开民营资本准入已有很多年，但阻力未曾小过。

史晋川：国家先后出台了两个 36 条助推民营经济发展。从国务院这个层面来看，发展民营经济是大原则和方向，问题在于部分掌握“生杀大权”的部门并未严格执行。比如说杭州跨海大桥，国有资本一进去，其他民营资本就要退出来。为什么？因为在很多地方，只要有国有资本控股，甚至只要国有资本参与，它就一定要变成“老大”，就不按照现代公司治理规则出牌，这就是民营资本生存现状。当然，某些特定行业需要“集中”，如一些大宗商品如铁矿石的进口。如果太分散，就不利于对外谈判形成统一力量。大家把铁矿石价格抬上去，国内企业吃亏。关键在于，国营和民营资本都应有相对平等的进入权利，有效竞争会制约垄断，才会维护一个规范的市场环境。

本简讯全部内容可免费登陆
<http://www.crpe.cn> 阅读或者
致信致电本中心索取。

主办单位：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

地 址：杭州市浙大路38 号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四楼

邮 编：310027

电 话：（086）-571-8975-2835

传 真：（086）-571-8975-2835

电子信箱：crpe@zju.edu.cn

网 址：<http://www.crpe.cn>

（内部资料 仅供交流）